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基于西安市的实证调查

罗大文 等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基于西安市的实证调查

■ 罗大文 等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基于西安市的实证调查

/ 罗大文等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 - 7 - 224 - 10330 - 4

I. ①新… II. ①罗… III. ①民工—城市化—研究—西安市 IV. ①D42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5062 号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基于西安市的实证调查

作 者 罗大文等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陕西汇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21 印张 2 插页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10330 - 4

定 价 46.00 元

撰稿人：罗大文 徐雅妮 任娟娟

汪小宁 靳宇 马冬梅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一、研究的缘起	1
二、研究的意义	5
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文献述评	9
四、本书的框架结构	20
五、调查方法与数据说明	23
第二章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特征和环境变量	26
一、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内涵分析	26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	39
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环境变量	50
四、制度环境：进一步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环境变量	59
第三章 社会公正：审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新视角	80
一、社会公正的基本思想	80
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不公因素	97
三、社会公正视阈中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108

第四章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一般状况	124
一、调查方法与数据说明	124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和生存状况	127
三、社会公正视野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诉求	145
四、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的比较	154
第五章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	161
一、引言	161
二、文献综述	162
三、研究设计	165
四、研究发现	172
五、结论与讨论	193
第六章 国外农民市民化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借鉴	207
一、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的历程及经验	208
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农民市民化的历程及经验	224
三、启示与思考	235
第七章 创新社会管理 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240
一、公平正义: 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	240
二、制度公正: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制度环境的优化	250
三、起点公平: 改革与完善教育培训制度	262
四、司法公正: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法制保障	271
五、政治参与: 积极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合法权益	276
六、社会认同: 城市融入的社会心理基础	283
七、社会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支持网	293
小结	300
参考文献	302
附录一: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研究调查问卷	309
附录二: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访谈大纲	320
后记	323

第一章 导 论

“中国工人”被选为美国《时代》周刊 2009 年年度人物,并被排在第三名位置上,表明中国农民工不仅对于中国经济社会作出巨大贡献,而且对于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农民工的地位和身份如何变化,决定着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前景。近年来,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也有着与该称呼相对应的当今世界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这一队伍的主体,正是被称为新产业工人的农民工。

一、研究的缘起

随着时光流逝,第一代农民工已经开始逐步退出城市返乡,出生于 1980 年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的工作生活境遇、对自身的期望与对社会的认知,他们与父辈的差异等已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大量研究显示,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更强烈,对劳动法律法规的了解和认知程度明显提高;也较有维权的勇气,更愿意为维护自身权益而参加群体性活动。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的未来,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状况、社会交往、政治参与状况等各方面的情况和变化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值得跟踪研究和关注。

在几乎所有的工业化社会和正在经历工业化的社会中,城市工人阶层的形成和发展是社会结构变革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中国社会农民工阶层的发育和成长,也成为当代中国最引人注目的结构性变革之一。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在原有社会结构框架内外迅速地出现了社会分化,农民这个中国社会人数最多、最庞大的社会群体在农村非农化的发展中也开始迅速分化,形成了职业的多样化趋势。农民工成为改革开放进

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据对全国 31 个省(区、市) 6.8 万个农村住户和 7100 多个行政村的农民工监测调查结果推算,2011 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5278 万人^①,其中外出农民工 15863 万人,与 2010 年相比,农民工总量增加 528 万人,增长 3.4%。举家外出农民工 3279 万人,增加 208 万人,增长 6.8%^②。

表 1—1 农民工数量

单位: 万人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农民工总量	22542	22978	24223	25278
1. 外出农民工	14041	14533	15335	15863
(1) 住户中外出农民工	11182	11567	12264	12584
(2) 举家外出农民工	2859	2966	3071	3279
2. 本地农民工	8501	8445	8888	9415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2011 年我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http://www.stats.gov.cn/was40/>, 2012 年 4 月 27 日。

西安是陕西省省会,全省和中国西部地区经济文化科技交流中心城市,西安市已成为农村劳动力的重要输出地和主要的输入地。它是陕西省农民打工的最主要城市,同时也是部分新疆、宁夏、甘肃、四川、重庆等部分西部省(区、市)及河南、山西等中部省份的农民外出打工的聚集地。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农民工已经成为融入城镇大动脉里的特殊血液。据西安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西安市在 2010 年 11 月 1 日零时(普查标准时点)的

① 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 11·阶级结构与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48 页。

② 国家统计局:《2011 年我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http://www.stats.gov.cn/was40/>, 2012 年 4 月 27 日。

常住人口为 846.78 万人,其中外来人口 234.59 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为 27.7%,即西安市每 3 个人中就有近 1 个是外来人口。可见,西安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农民工,同时也离不开农民工的社会管理与服务。

2011 年陕西省办理进城落户的农民达到 52 万人,2012 年 1 月至 5 月共办理进城落户农民 51.6 万人。按照规划,“十二五”期间,陕西全省平均每年将有 110 万农民进城落户。目前,在西安市务农的农民工总数就已超过 110 万~140 万。如何同时解决城市化发展目标和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当务之急。

我国如今的城市化策略是大中小城市齐头并进,但是对于众多农民工来说,在大城市安家落户的困难远远大于在中小城市。而且我国几个特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深圳的落户政策随着城市人口的暴涨不但没有放松,反而有加紧的趋势。所以在中小城市或者西部城市落户成了很多人的理智选择。

2011 年西安市 GDP 达到 3864.21 亿元,人均 GDP 于 2010 年就突破 5000 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地区)水平,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城市面貌极具魅力^①。但与此同时,据陕西省社科联、陕西省政协社法委 2010 年联合组织的一次长达 8 个月的调查显示,为西安建设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西安农民工数量已经超过百万,并以每年 10% 的速度递增。他们普遍月收入不到 1500 元,每周工作长达 6.4 天。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新市民,社会各界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讨论,正在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不仅这样的讨论常见于学术文章,而且如何解决好这一问题也已成为政府部门的政策配置重心。对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 2010 年中央 1 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文件首次正式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提法,该文件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传递出中央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高度关切。

^① 宋浩:《西安人均 GDP 已达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高级消费提高》,《西安晚报》2012 年 4 月 13 日。

改革开放以前,受城乡二元体制的严格限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人为地“沉淀”在土地上,造成了事实上的人力资源浪费。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国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自发地、大规模地、持续地跨地区向大中城市,特别是向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城市流动,形成了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民工潮”。农民工是农村人口最容易选择的职业,因为大部分农村人口没有多少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而有的是劳动力资源,但是他们不喜欢务农,特别是农村青年,视务农为没有出息的职业选择,他们纷纷外出打工。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阻隔城乡联系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受到了巨大冲击,农民逐渐恢复了流动的活性,大量进入城镇或其他经济活跃地区寻找就业机会,寻求新的生活模式,形成了世界工业史上特有的农民工现象。改革开放已30多年,农民工也已经历了两代,他们逐渐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规模巨大的特殊社会群体。在中国这样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中,农民工注定是特殊的一群——他们游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既不完全属于城市,也不完全属于农村。而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这一特点更加鲜明。

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由全面改革向以小城镇户籍改革为重点转移,本地城镇在户口制度上对务工农民定居的制度性排斥力量减弱,有助于非农就业的农村居民彻底离开土地,促进农村非农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发展。

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第一代农民工将非农就业经历更多地视为收入增加的渠道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对其非农就业经历,有着提高自身及子女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状况的期待,城乡间因就业而发生的个人地理空间流动,开始包含以城乡差异为基础的个人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愿望。我们访谈发现,部分农民工家庭经济条件挺好,外出打工是因为在校学习不好未能升入高中或者大学,而在家待着自己感觉无聊,还被村里人说闲话,村民认为不上学在家待着没有出息,这种评价甚至影响到将来谈对象。基于这样一种逻辑考虑,不上学的孩子们往往在不上学半年之内即外出打工。近年来一些大中城市出现的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接受流入地义务教育人数逐年上升的现象,就表明新一代农民工在进城务工提高收入的同时,也希望分享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以改善子女的受教育条件。因此,通过非农就业从而实现在城镇定居已逐渐成为农民外出务工的生活预期和决

策机制的组成部分之一。

二、研究的意义

(一) 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最终破解“三农”难题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温家宝总理 2010 年 2 月 27 日与网民在线交流时,提出“农民工已是现代产业工人队伍的主体”,所以我们应该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位为“产业工人”。目前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大部分制造业工厂的主体是新生代农民工,不少大都市的建筑业、家政服务、餐饮服务,甚至楼堂馆所的服务人员 90% 都是新生代农民工;而各大煤矿、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体,除了机器就是新生代农民工了。新生代农民工早已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从最基础的体力劳动到高级技工,他们无所不在。但目前我国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享受到产业工人的待遇。

随着农村开放程度的提高,随着社会信息覆盖面以及信息量的扩大,随着农村市场化、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基层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农民的个性意识必定会增强,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程度也会提高,相应的,农民对于自身在社会中所处的弱势位置越来越会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和清醒的认识。如果农民的弱势地位不加以改善的话,那么,为数众多的中国农民对于社会就会有一种抵触的情绪,并有可能通过种种行为方式表现出来。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李强教授认为,户籍制度是城市农民工特殊社会分层地位的首要制度原因;农民工当中有底层精英存在,如果他们的市民化过程不能顺利进行将会影响社会的稳定^①。比如,农民工越来越体验到了“城乡收入差距和生活质量的差距,他们的心理开始变得失衡了,人类的尊严觉醒,驱使他们通过某种渠道寻找心理平衡,然而社会留给他们的空间和所能提供的机会又毕竟是那么狭小和稀缺,以至于正常的方式很难满足其对有关价值和经济收入的要求,结果某些人在行为选择上就

^① 李成贵:《中国农业政策——理论框架与应用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7 页。

可能失控甚至铤而走险,而且他们的行为可能不仅仅局限于纯粹的经济收益目的,而可能体现具有表现性的意义”^①,这对社会的正常运行是十分不利的。

农民工是中国产业工人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农民工的工作、生活状况和社会态度,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农民的生活改善都密切相连,这也是我们的调查所关注的主题。

(二) 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加速推进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提升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必然要求。城市化是人类文明进步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重要路径。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提升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顺应经济发展趋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然要求,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2011年7月15日,《半月谈》杂志发布“新生代农民工尊严感”调查结果。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影响尊严感的四大因素是:工作情况、城市生活融入情况、公民权利的实现、与亲人朋友的关系。这标志着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的层次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主力军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贡献重大力量。对于具有强烈市民化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只有给予其正式的市民身份,切实保障他们在就业、社会保障、职业培训、生活居住等方面的合法权益,提高其经济和社会地位,使其逐步融入城市社会,才能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充分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从而增强他们贡献社会的积极性和对整个社会的认同感,减少他们的反社会情绪和行为,才能形成一个充满活力、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局面。而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边缘化状况无疑与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相

^① 李成贵:《中国农业政策——理论框架与应用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悖。2010年春夏之交,富士康员工以十三连跳的染血代价换来了工资的提升,紧随其后的广州本田工人通过罢工也获得了涨薪的结果,并随之影响大陆其他地方出现类似情景,一时间罢工事件此起彼伏并被媒体称之为“工潮”或者“群体性事件”,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工潮”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从而备受瞩目。这一切都迫使中国企业直面经济转型,同时迫使有识之士反思如何加快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步伐。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比例达到了51.3%。现在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这意味着中国从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城市化进程带来了人口、资源向城市集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了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中国未来的长远发展,以及彻底解决困扰多年的“三农”问题,都需要继续保持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继工业化之后,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已成为拉动中国巨大社会变迁的“三驾马车”。

但是,有一组数据令人担忧:到2011年底,尽管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口比例已达到51.3%,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就是说,有13.6%即1.28亿人口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但并没有成为户籍意义上的市民。这一现象表明,我国目前人口的市民化程度是滞后于地理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的。这意味我国半城市化人口达到1.28亿^①。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新生代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城市边缘,遭遇种种不公平的待遇,虽然他们为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却无法融入城市。当他们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得不到社会认同和扶持时,就会产生不平衡的心理,引起价值观念的畸变和行为的失范,进而影响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① 关于“半城市化”,研究者概括其表现为:农民离开乡村到城市就业与生活,但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在城市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即1.2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待遇。

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民的前途只有一个,这就是非农化。但是,中国社会目前在自由迁徙方面对农民的限制、在农民进城后对其工作和生活方面的歧视,以及强化土地对于农民最低生存限度保障功能等做法,客观上是起了限制农民进城、让农民无法离开土地,进而将城市和农村继续分隔开来的作用。毫无疑问,这是在维护而不是消解中国已有的二元化的社会经济结构,直接阻碍着城市化的进程。这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也不符合现代化的趋势。这是因为,市场化、城市化和较高速率的社会流动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内容。市场化、城市化和社会流动水平如何,往往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我国现在第一产业中的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例已下降至 40% 以下,而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却只有 36%,这不能说是一种正常的现象。究其根源,很重要的一点便在于此。

从一般意义看,农民工是工人,应该与城镇国有企业工人没有什么不同,都属于工人阶层。但是,他们因为有农民身份,所以在政治上享受不到工人待遇。比如,在权益保障方面工会不管他们的事情,遇到劳动纠纷、工伤事故等,往往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在社会福利上,他们不享受国家给予城市国有企业的工人的待遇;在经济上,他们的状况虽然比农业劳动者好,但一直只能获得低工资,在最近的 10 多年里,有很大部分农民工的工资一直处在 800 ~ 1000 元的水平,没有任何增加或者增加缓慢,尽管国家职工的工资在不断得到调高。所以,尽管许多农民因为务农实在无利可图而纷纷外出打工,但在城市里,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工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其社会地位甚至比在自己家乡还低:他们不仅工作辛苦,而且居住环境恶劣,备受歧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①。

规模高达 2.5 亿的农民工已经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变化。毫无疑问,对于这样一支庞大的生产力量,城市需要他们。不光是中国,世界也需要他们。“中国制造”的国际消费者们,多年来受益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令他们消费支出减少。

^①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1 页。

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文献述评

在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研究中,对于农民工群体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概括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是收入分配的持续恶化,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从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642元人民币增长到22640元;而收入的基尼系数也从0.356快速上升到0.449(国家统计局,2006)。作为弱势群体而生存的农民工问题以及农民工市民化已经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一) 国外(海外)学者的研究简况

近20年来,海外学者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几种有影响的理论:

1. 市场转型理论^①

受博兰尼和泽林尼等的启发,倪志伟(Victor Nee)将决定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的模式区分为再分配制度与市场交换制度两种类型。他认为,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再分配制度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的过程中,掌握再分配权力者,例如干部或党员的收益将会减弱,而私营企业主与人力资本的拥有者将会获得市场青睐。尽管他并未研究农民工现象,但其提出的基本问题:经济的整合原则由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变,及其与权力结构的关系,却为以后的包括农民工研究在内的社会分层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以至于可以说,以后的众多研究是在对倪志伟市场转型论的批判和修正中发展起来的。

2. 制度变迁论

与功能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不同,制度主义研究社会不平等现象强调制度分割、结构壁垒,认为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不能简单化为量上的不同,而是具有质上的差异。海内外部分学者开始探究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特殊制度,诸如干部身份制、户口制度和单位制与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不平等的关联。这些研究从不同的分析角度回应了制度分割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① 边燕杰《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三联书店2002年版。

3. 公民权理论

苏黛瑞(Solinger)认为,市场首先创造了城市对于外来人口的需求,并为其中的少数人提供了积聚财富的机会;流动人口与市场一道把自己塑造成初始的公民。苏黛瑞认为现代公民权问题由两个方面构成:第一是社会成员资格或身份的问题,即归属于某个共同体的问题;第二是资源的分配问题。换言之,公民权的根本特征是排斥,因为它将权利和特权仅仅赋予那些特定共同体的成员。在这种公民权概念下,苏黛瑞联系中国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遗产,特别是户口制度,从农民工、国家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考察分析城市农民工问题。她认为,对于那些从农村流动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来说,问题不仅仅是暂时缺乏由国家提供的维持日常生计所必需的条件,关键在于,由于不拥有城市户口,他们根本没有“资格”享有城市中的正常生计,没有“资格”享有城市居民作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加以接受的那些社会福利和服务。在中国只有那些拥有官方确认的城市户口的人才是国家承认的城市社会共同体的正式成员,而那些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在自己国家的城市中的身份,则就像是其他地方的外国移民,是“非公民”。因此,对于进入城市中的农民工来说,根本问题不在于直接去争取维持生计的收入、福利、服务等,而是争取获得这些待遇和机会的“资格”,也就是争取“公民权”。不过,对于农民工获得完整公民权的前景,苏黛瑞认为,尽管市场化已对那种建立在户口制度上的公民权提出了挑战,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国家、城市政府、原先的城市居民等均不愿放弃现有的户口制度——苏黛瑞将它看做是中国的一项根本性的政治制度,农民工要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权并不容乐观。苏黛瑞的研究在海外及国内学界也引起了较多的关注^①。

4. 劳动力流动论

魏昂德(Walder)认为,改革使农民的自主性增强,在创造新的生活机会中不再依赖农村干部。这一过程同时也受到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的影响。从农业型社会转变为工业型社会的过程,会促进结构性的职业流动,扩展工薪劳动力的机会,增加对人力资本的回报。国外学者主要从劳动力

^① [美]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王春光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8页。

流动的角度来关注中国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包括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征及趋势,农村劳动力流动对输出地、输入地产生的影响,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性别问题,政策对于市民化的影响等问题^①。白威廉(William L. Parish)等从社会流动角度探讨了劳动力需求与劳动力迁移的关系:当农民进城后,主要从事的事业是体力型职业^②。

国外(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多采用和国内学者合作的方式,数据收集则更多运用现有数据,对理解和把握我国农民工问题及扩展研究视角有一定的影响。

(二) 国内研究概况

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首次出现“农民工”一词,随后这一称谓逐渐被广泛使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农民工群体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国内外大量学者对之进行了研究。

围绕“农民工”这一影响重大的中国特有现象,我国学者展开了大量的研究,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都积极参与其中,诸学科从各自角度都予以了充分关注。他们的研究从社会分层、制度安排、社会支持、现实状况等多方面入手进行研究。

其中包括许多涉及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动因、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化、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农民工的再社会化等主题的研究,形成了相当丰富的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的研究成果。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出现的问题,目前学界尚未在概念上达成共识,学者使用“新生代”、“新质”、“第二代”等诸多概念定义目前分化出来的新的农民工群体,而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新分化出来的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态、特征、思想意识等方面。

各种研究都表明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核心,

① (美)魏昂德《市场与中国农村的收入不平等》,边燕杰等:《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167页。

② (美)白威廉等:《非农劳动与中国农村的市场化》,边燕杰《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60~296页。